

因覺而悟

禪的管理智慧



张应杭 编著

因

情

而

情

王应杭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的管理智慧/張應杭編著. —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166-690-9

I. 國… II. 張… III. 國學-應用-管理學
IV. C9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23303 號

國學的管理智慧

(一函三冊)

出版 中國檔案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區豐盛胡同二一號)

發行 杭州博覽群書圖書有限公司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浙江省富陽市江濱東大道二一號)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

印數 一——五〇〇

定價 伍佰捌拾圓

ISBN 7-80166-690-9



9 787801 666901 >

ISBN 7-80166-690-9

自序

以佛家的话说是一种因缘际会，一九九七年我以『边缘人』的角色进入了此前从未想到会涉足的管理学领域。多少让我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在管理学的丛林中我却因着无心插柳而拥有了自己的一方领地。几近十年的不懈劳作，我的『儒、道、禅与现代管理』课程渐渐地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认同。这些年，我不仅在上海大众、红蜻蜓、西子奥的斯、IG等十多家企业作过培训，而且还应邀在电视台的『名家论坛』中讲授《东方智慧》。儒、道、禅与现代管理》的系列课程，反响颇为热烈。这套《『国学』中的管理智慧》可以说是应出版社约请以文字的形式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的续篇。

记得一次在北京大学讲学时曾接受某记者的采访。在回答她『如何看待管理培训中的国学热』这一问题时，我谈了两点看法：从宏观背景看这和当前我们开始重视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相关。一个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和魂，而它往往就积淀在『国学』中。从微观背景看，中国企业发展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如何将『西学』本土化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紧要关头了。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此打造中国特色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当然很多，但是，从传统管理之道中汲取智慧的营养显然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业界人士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因为中国古代以『道』为尊的管理智慧的确可以为现代管理提供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营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儒、道、禅为代表的传统管理智慧对现代管理者人格修炼修为还尤其凸显其清明的指引意义。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效地抵御来自两方面的诱惑：一是做企业过程中市场经济必然内含的利润最大化法则的诱惑；二是做人过程中刚性递进的财富占有欲的诱惑。而向以『义利合一』为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庸惟美』（儒）、『自然无为』（道）、『空观』（禅）为处世之道的传统文化无疑为我们在这一疑惑面前拥有一份定力，从而守持住一颗道义之心提供着诸多的智慧指引。因此，这些年来我始终认为，极易在市场经济锱铢必较的拜金主义，甚至声色犬马的诱惑中迷失自我的现代人，极其需要儒、道、禅智慧之光的理性烛照。

需要申明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者在这里所阐发的只是沧海一粟。正文中之所以用『九大智慧原则』来编排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因为在中国传统中『九』为阳数之最，我试图用它来表示传统管理智慧之博大。至于把《论语》、《道德经》和

《坛经》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放在正文里进行导读，无非是想让大家能够原汁原味地感受古代经典的现代魅力。末尾所附的『主要参考文献』既是我写作本书时大量借鉴其思想的范本，同时也是我向读者诸君提供进一步阅读的一份大略书单。

惟愿读者诸君能够开卷有益。

谨以此为序。

张应杭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日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目 录

【佛教概述】

〔一〕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佛教原本是外来文化。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于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城。相传他出家修道，经过多年的修行与冥想，最后在菩提树下悟得『无上正觉』，成了『佛』。佛即佛陀的简称，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译为『觉悟者』。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老子等大致是同时代人。但是，这一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

表形态之一。

佛教的基本信仰与教规

如果我们撇开佛教作为宗教的制度和仪轨而专注于其启迪人生觉悟的教义，那么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佛家。这一点在强调『顿悟成佛』的禅宗中表现的特别明显。所以它与儒道两家一样探讨的同样是人生之道的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其智慧的体悟与践行同样是现代人的重要功课之一。

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发展岁月。其间经过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相排斥、互相比较、互相吸纳的过程后，最终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本土文化融汇为一，并形成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一〕

【佛家管理智慧的九大原则】

空观大千世界

佛家『空观大千世界』的教义就内蕴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智慧，它事实上为管理者提供了身心追求的『空灵』境界。在佛家看来，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和大千世界构成『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之总括。如何看待这一大千世界，佛家从『四大皆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以『空』观之。

诸法无我

常人总以为『我』是独立自生的永恒不变的主宰者。佛家认为这是妄见，唯有无我才是真见。因此，佛家认为世上芸芸众生，要是一旦悟彻『诸法无我』原理，便就立时离苦得乐，脱却束缚，获大自在，使个人的精神境界，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升华。

普渡众生

佛家这一倡导对『众生之爱』的思想，作为处理我和众生的关系的一个原则，它强调的是『众生相聚即是缘』。这显然是佛家管理智慧中很高明的待人之道。它能够让习惯于接受个人主义甚至是自我中心主义的现代人领悟出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不二真谛

只要我们认真研习一下佛门的『不二』说便可以发现，佛家的『不二』真谛揭示的问题其实正是人生处世所要正确把握的一些基本关系问题。从管理学的角度讲也就是管理哲学所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几大关系问题。

规戒人生

佛陀讲『以戒为师』是指引众生的解脱法门。因为戒律能给人绝对的完全感，使人能放下一切身心内外的不满足、舍不得、看不开，它是佛法无边之普遍性的体现，自然地也是最重要的管理法则。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最基本的管人管己的管理法则。

敬畏果报

尽管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三世轮回是因果』之类的说法是虚无缥缈的，但是我们依然要告诫自己：相信现实的『果报』。因为因果报应实在是一条铁的法则，善一定会有善作为回报，而恶总是会遭到惩治的。

四摄修行

『四摄』修行的佛门教义与现代管理学中的团队精神可谓是异曲同工。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西方管理学界开始意识到个人主义的危害性之后，要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的儒家和佛家。因为以儒、佛两家为代表的利他主义精神恰恰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传统文化所欠缺的。

拈花而笑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一次灵山法会上向弟子讲道，佛祖一言不发，只是手里拈着一朵花，面对着众弟子微笑。佛家在这里讲

的是『化烦恼为菩提』的修行道理。它要讲的是，人生最大的道在于永远微笑着对待生活。佛家常诵的『阿弥陀佛』的意思就是永远的微笑、永远的美好之意。

因觉而悟

无论是儒家的『由道而德』，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佛家的『由觉而悟』都提供的是一种东方式以心性启迪为基本思路的管理之道。这一柔性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正日益凸现出来。

〔六〇〕

【禅宗经典——《坛经》选读】

《坛经》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向以儒、释（佛）、道三教合一为其基本内涵。因而，在学习、整理和发掘古代哲学遗产时我们不可忽视佛家经典的存在及其对中华文明史的巨大影响。佛家经典卷帙浩繁，我们在这里选择较有典型意义的禅宗经典《坛经》进行一些基本的阐释，试图达到『窥一斑以见全貌』之效。

《坛经》原文、注释和今译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一五四〕

【主要参考文献】

一、佛教概述

与儒家和道家不同，佛教原本是外来文化。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俗姓乔达摩，名悉达多，出生于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城。释迦牟尼原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相传他出家修道，经过多年的修行与冥想，最后在菩提树下悟得『无上正觉』，成了『佛』。佛即佛陀的简称，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译为『觉悟者』。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老子等大致是同时代人。但是，这一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形态之一。

事实上，如果我们撇开佛教作为宗教的制度和仪轨而专注于其启迪人生觉悟的教义，那么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佛家。这一点在强调『顿悟成佛』的禅宗中表现特别明显。所以它与儒道两家一样探讨的同样是人生至道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对佛家智慧的体悟与践行同样是现代人的重要功课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

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道后开始传教，并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其内容主要有『四圣谛』、『八正道』及『十二因缘』等。后来佛教又形成了小乘和大乘两大派系。乘即运载的意思，大乘自称旨在运载一切众生达到涅槃境界之彼岸，所以叫大乘；而那些坚持原始教义，只求自我解脱的教派则被称为小乘。大乘又有显教和密教之分，密教由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印度教结合而成，其特征是主张身、口、意三密相应行，以求得出世的果报。其他以语言文字明显表示佛教教义的教派，统称为显教。显教又可分为中观派和瑜伽派。

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年代大约在两汉之际，即公元一世纪前后。传入中华本土之初，当时的人们只把它看作是神仙道术的一种，以为佛有神通，变化无穷。

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大力推行玄学，使其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于是，佛教学者往往使用老庄玄学思想和语言来解释佛教，称其为般若学。这种方法被称作『格义』。『格义』从义理上融会中印两种不同思想，消除了交流中的文化隔阂。并因此产生了般若学的『六家七宗』说。僧肇撰《肇论》对魏晋般若学作总结性批评，把魏晋般若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东晋十六国时期，道安对汉译佛典作初步整理，还为僧侣团体制定法规、仪式，为以后汉地佛教的寺院制度打下基础。道安弟子慧远则精通佛、儒两家之学，

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也由此开始,佛家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南北朝时期,大多数统治者都提倡和支持佛教。但总的来说,南朝偏重义理,北朝崇尚实行。南朝梁武帝不仅重视佛教实践、身体力行,而且也大力提倡儒家义理之学,依据儒家纲常伦理原则,汲取和改造了佛教的义理,在儒、佛融合的历史趋势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整个南朝,有关涅槃、佛性、渐悟、顿悟等问题的辩论曾经十分激烈,它取代般若学而成为佛学的主流。北朝佛教由于重在实行,所以其规模又远甚于南朝。据史籍记载,至北魏末年全国佛寺已达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余万人。由于北朝佛教注重修行实践,因此这一时期的士大夫往往以参佛修行为时尚。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也还表现在建造寺宇、凿窟雕佛像方面,譬如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都系北魏时开凿。

当然,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北朝佛教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事件是北魏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这是北朝佛教兴盛过程中的重要曲折。当时几乎所有寺院都遭破毁,损失惨重。灭佛事件从思想原因上看,是儒、道、佛三家斗争的产物,而从经济原因上看,则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迅速壮大,损害了王朝的经济利益,加深了与世俗地主的矛盾。灭佛运动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挫折。

隋唐重新统一南北,建立起强大的封建王朝。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又进入其繁荣鼎盛时期。唐朝统治者在佛、道关系上予以调和,儒、道、佛三教一方面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趋于圆融一致,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思想准备。唐太宗时,佛教最重大的事件是玄奘西游印度和归国译经。武则天执政期间更是始终大力支持佛教,她曾与法藏大师问对长生殿,敷宣玄义,成就《金师卫章》(即《华严经》)。所以,唐朝至唐玄宗为止是佛教发展的一个非常发达的时期,甚至如唐玄宗虽是著名的道教君主,但开元盛世保证了最高统治者的自信,也能够容纳不同类型的宗教文化。唐玄宗曾经亲自为《金刚经》作注,并令颁行天下。

『安史之乱』后,徭役和赋税日重,民众纷纷以寺院作为逃避之所。于是,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反佛意识又逐渐上升。韩愈在《原道》中甚至提出『灭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至武宗时终于付诸实施。唐武宗灭佛,从会昌初年(公元八四一年)开始,至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达到高潮。其结果共毁寺院四千六百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会昌灭佛,给予佛教以沉重打击,佛教从此由极盛状态而开始走向衰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佛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而且还广泛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周边各国,形成东亚佛教文

化圈。佛教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甚至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异彩纷呈的重要一页。

这一时期佛教自身的发展则呈宗派林立之景象。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最初没有宗派的门户之分，后来由于翻译事业的逐渐鼎盛，佛典的大量译成，以及佛家学者对于佛法的分类判摄，才开始有宗派的出现。

中国佛教的宗派，最先出现的是由东晋时代鸠摩罗什译介的三论或四论宗，这是印度空宗的法脉，到嘉祥大师而集其大成。同时还出现了依据小乘的成实论的成实宗；依据小乘有部的俱舍论而有俱舍宗；依据涅槃经而成涅槃宗；依据十地论而成地论宗；依据摄大乘论而成摄论宗。印度高僧达摩西来，传佛心印，而成禅宗；由唐代道宣专弘四分律，而成律宗；依据对法华经的领悟，至智者大师而成天台宗；著名的玄奘大师西游归来，据唯识论而成法相宗；依华严经的综合开悟，至贤首大师而成华严宗；自慧远大师倡莲社专修持名念佛，至善导大师而成净土宗；最后由于唐代开元年间，西域来了善无畏等三位密教的高僧，译传了密部的经法，而成立了密宗。

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共有十三宗之多，其中除了成实与俱舍两宗属于小乘佛教，此外都是大乘佛教。后来，由于各宗的相摄相容，十三宗中的涅槃宗归入天台宗，地论宗归入华严宗，摄论宗归入法相宗，所以最后剩下了十宗。

中国佛教的宗派可谓洋洋大观，但自晚唐以后的佛教，小乘不受重视，三论、唯识，已无人研究，密宗在中国消失，倒是流去了日本。中国的地理及社会背景，无法严格地要求戒律的遵行，所以律宗也是若存若殁地存在而已。唯独禅宗一枝独秀，以致禅宗在六祖惠能之下，又分出了五家宗派，五家之中以临济及曹洞二派发展得最盛最久。我们甚至可以说，今日的中国僧尼，几乎全部是出于这两家的法脉而来。所以一些佛教史的研究学者甚至认为，晚近的中国佛教，参禅几成僧侣的主要功课。禅宗也由此被视为是佛教中国化的最经典体现。事实上，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完全摆脱了印度原始佛教的义理，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所以禅宗又被特称为『中国禅』。

禅宗中的『禅』是梵语『禅那』(Dhyana)的略称，意译为『静修』，它是印度各种教派普遍采用的修习方式。但是印度佛教只有禅的修行功课而没有禅宗，所以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也是中国佛教最主要的宗派。它因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禅宗的初祖为印度和尚达摩，传至五祖弘忍，『达摩禅』声誉大振。后来五祖又传禅宗衣钵于六祖惠能。由于惠能和尚及其弟子的努力，禅宗成为了这一时期佛教最具影响力的流派。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六祖惠能才是中国禅宗的真正创始人。这首先是因为禅宗的主要经典是惠能的《坛经》，而且在中国佛教学者的著述中，只有《坛经》被唯一尊称为经，这足以说明《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也是因为禅宗在惠能时期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无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禅宗的发展来看，弘忍之后，禅宗开始分为『北宗禅』（神秀）和『南宗禅』（惠能），南北禅宗根据如来藏佛性学说，在如何去除烦恼，如何修行的问题上存在着对立分歧。神秀认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即在神秀看来，佛性人皆具有，但为尘土所障，所以要时时拂拭，不断修习，成佛才有可能。惠能则认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与神秀不同，惠能认为人的心性本净，自性是佛，不必经过繁复形式的修习便可进入佛的境界。北宗禅注重『息妄修心』，循序渐进，是渐修的禅。南宗惠能则『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把修行归结于『顿悟』，提倡直觉能力的发挥，刹那自觉自己所具的佛性，即所谓的『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所以惠能在《坛经》中称自己的这门教派为『顿教』。

惠能为代表的南禅宗为『顿悟成佛』指出了一条简便方便的成佛道路，把自心等同于佛性，从而有力地破除了对『西方经典』的迷信和对『佛祖』的盲目崇拜。后百丈怀海制订『百丈清规』，提倡修持与劳动相结合，别立『禅居』，使禅宗僧侣直接从一般寺院中分离，成为自主独立的部分。至『五家禅』相继建立，则标志着禅宗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当然，这一时期的净土宗也依然很有影响。正如前已提及，净土宗的创宗者为善导，它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要经典。净土宗宣扬依阿弥陀佛的愿力，只要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被接引去西方极乐世界（即『净土』）。它的特点是依恃他力，修行方法也非常简单。所以它在民间有着极多的信徒。

唐武宗灭佛后，佛教各派日趋没落，只有禅宗、净土宗继续盛行。宋代佛教在对外提倡三教合一的同时，内部则展开向净土信仰的『殊途同归』。除了上述宗派，还有主要流传在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与西藏原有的本教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也是中国佛教不可分割的重要门派。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禅宗成为佛教中国化的最典型的代表形态，而且在今天的诸多佛家信仰者那里，它也是最拥有信奉者的一家。所以，今天在国外政界与管理层流行的禅宗修炼功课被特别地称为『中国禅』。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禅与心理分析》（与当代西方著名的学者弗罗姆合著）对禅的推崇、英国禅学中心约翰·克鲁克主张『以佛疗心』

等讲的也都是『中国禅』。现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禅教义中人生智慧的发掘已成为一种『显学』。

佛教的基本信仰与教规

佛教的基本信仰，包括伦理宗教理想和宇宙『真实』图景的学说。佛教的伦理宗教理想，集中表现在释迦牟尼提出并由后代佛家加以发挥的『四谛』说上。『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谛』是真理的意思。『苦』是痛苦，『集』是原因，『灭』是寂灭，是佛教追求的理想境界，『道』是途径、方法。因此，佛家在其教义中揭示的『四谛』就是阐述如下四种真理：人生的痛苦现象、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指明解脱人生痛苦的理想境界和解脱痛苦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

佛教把宇宙中的有情识和证悟得道的生命体分为『四圣六凡』。『四圣』是『声闻、缘觉、菩萨和佛』；『六凡』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和地狱。人是六凡中的一凡，这表明了佛教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佛教又认为人身由色、受、想、行、识『五蕴』和合而成。佛教中的『色』，是物质存在，主要是指肉体等的物质性存在，也包括自然界地、水、火、风等『四大』元素的存在。『受』是指由感官生起的感觉、感情（又曰『情』）。『想』是理性活动与概念作用（又曰『智』）。『行』则专指意志活动（又曰『意』）。最后一个是『识』，它是统一前几种活动的意识的综合过程。佛教认为人是这『五蕴』和合而生，分散而灭。因此，人的生命本质是『空』的，也即是说人生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都是『无常』的。

佛教由此断定人生为『苦』。八苦是其最常见的说法，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取蕴苦。在佛教教义看来，人生一切皆苦，因此苦海无边。这也可以说是佛教人生观的理论基石。佛教又用『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说来解释人生痛苦的根源。『十二因缘』也称『十二分』或『十二有支』，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上述十个环节，辗转感应，所以称为因；互为条件，所以称为缘，合称『十二因缘』。在佛教看来，痛苦的最终根源为无明，无明又是情欲的产物，所以要灭尽无明，就需斩绝『六根』（耳、目、鼻、舌、身、意），摆脱『六尘』（声、色、香、味、触、法），否则生命痛苦的锁链将永远连续。『业报轮回』说则强调个人作『业』的因果，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业』指众生的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有意业（心理活动）、口业（发之于口）、身业（身体行动）三种。众生所作的善业和恶业都会引起相应的果报，有的当世报，有的来世报，修善的有善报，在『六道』中随福业而上升，反之，修恶的有恶报，在『六道』中随福业必然下降，即所谓『三世业报』、『六道轮回』。

佛教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超出轮回，不再受生，以达到『涅槃』。小乘的涅槃学说，一般称为无余涅槃，把经过修持，消除烦恼，

并在死后焚骨扬灰、不留痕迹的消灭状态，作为追求的目标。大乘中观学派的高僧龙树则提倡实相涅槃。龙树主张的实相涅槃有两个要点：其一，龙树认为众生所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正确认识一切事物的『实相』（本来面目），实相是『涅槃』的内容，世间实相与涅槃是一回事，两者本性都是空，涅槃境界就是对实相的认识和运用。其二，追求涅槃者要普渡众生，即使个人可以进入无余涅槃，也决不进入。所谓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这也称为『无住涅槃』。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别，还主张追求和找到人生真正的常、乐、我、净，为人生理想开辟一新的宗教途径。中观学派把世间与涅槃打成一片，取消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鸿沟，从而缩短了人与佛的距离。也因此，大乘佛教学者主张研修那些为世间服务的知识，如天文、地理、医学、工艺等，这一主张影响了佛教的世俗化方向，也促进了佛教文化的发展。

佛教对达到最高理想境界的途径和方法，论述很多，尤其是大小乘的讲法也不尽一致。比较典型的是八正道、三学和六度说。所谓的八正道是指如下八种修行功课：其一是正见，主张离开邪恶与不是的正确见解，就是佛教智慧；其二是正思维，主张离开世俗的主观分别，离开邪妄迷谬；其三是正语，主张纯正净善的语言，远离一切戏谑之论；其四是正业，主张正当的活动、行为、工作，不作一切恶行；其五是正命，主张正当的生活，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其六是正精进，主张正确的努力，止恶修善，向解脱精进，反对懈怠与昏沉；其七是正念，主张正确的念法，即忆持正法，明记四谛等佛教真理；其八是正定，身心寂静，洞察人生的真实，获得身心的解脱。所谓的三学是指：戒学、定学、慧学，它由八正道归结而成。三学互相联系，通常被认为是学佛教修持的全部内容。所谓的六度，是对三学的扩充，为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具体有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和智慧度。六度意谓用作由生死此岸渡人到达涅槃彼岸的六种途径和方法，所以又被称为『菩萨行』。

佛教的宇宙『真实』学说，其基本论点有缘起论、无常论和无我论。缘起论是整个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石。在佛家教义中『缘』是结果所赖以生起的条件，『起』是生起的意思。缘起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生起，都是由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离开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事物和现象。佛教缘起论的实质讲的是事物间因果关系的理论，它主张世界万物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世界万物无一不由因缘和合而生。因果论的中心就是要阐明两种相反的人生趋向：即缘起流转（生死轮回）和缘起还灭（归于涅槃）的两大因果律。佛教大小乘各派都以缘起论作为自己全部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理论基础，各派的思想差异和理论分歧，无非是对缘起的看法不同。

无常论由缘起论派生出来。佛教义理中的无常，是说一切事物都受『缘』的制约处于不停迁流中，没有常住性。这无疑是一种卓越的辩证思想。当然，佛教主张一切无常的相对主义，尤其是发展到相信『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如来』，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破他人之『常』的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点，这又使『无常』说的辩证法睿智大大地打了折扣。

无我论是佛教从缘起论派生出来的又一重要理论。在佛家那里『我』是主宰和实体的意思。常人总以为『我』是独立自生的永恒不变的主宰者。佛教认为这是妄见，唯有无我才是真见。所谓无我，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没有独立的不变的实体或主宰者。无我有两种：一是『人无我』，即从无常必然推出无我，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二是『法无我』，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没有一定的住体。这种人、法无我的理论是原始佛教的基本学说，也是思想上区别于当时印度其它宗教派别的根本点。原始佛教宣传无我的理论，否定自我实体的存在，但同时又肯定众生业力的作用，提倡业报轮回说，无疑留下了巨大的理论矛盾。后来，大乘瑜伽行派立『阿赖耶识』及其种子，作为生死流转和涅槃不灭的根据，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内在的理论矛盾。

佛教的制度和仪轨，其内容主要有丛林、传戒、清规、课诵以及赞呗、忏悔、水陆法会、节日活动等。在佛家那里，丛林是借喻花木生长有序，用以表示僧众有严格的规矩和制度。中国佛教丛林通常指禅宗寺院。传戒，是设立法坛，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教徒传授戒法。大小乘戒法均有五种：『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和『菩萨戒』。清规，中国丛林清规形成于唐代，唐代禅宗盛行，就曾有《百丈清规》的厘订。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举行时间最少七天，多则四十九天，参加法事的僧人可达上百人，诵经设斋，礼佛拜忏，追荐亡灵，这是中国佛教的一种非常隆重的经忏法事。课诵是读经活动，其中所诵之经总称为佛经。《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由经、律、论三藏组成，『经』是佛的言教，『律』是佛为他的信徒制定的守则戒律，『论』是佛弟子的著述。中国佛教源自印度，又有别于印度，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气象和特质。形成中国佛教特点的原因基本上有社会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两方面。正是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佛教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新义理和新修养法门，形成了中国佛教和特殊性质的特殊文化现象。综观中国佛教的特点，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一些概括：

中国佛教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调和性。

这是就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而言的基本特征。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及其他本土传统思想，有分

歧、冲突和斗争，但佛教最后还是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对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不同观点采取妥协、迎合、附会、赞同、推崇、吸取和融合的态度。东汉三国时，佛教依附于道士、方术，这可以说是佛道调和时期；魏晋时期出现的《格义》就是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特别是老庄哲学的概念、范畴比附佛教经典的概念、范畴，而南朝梁武帝则大力提倡『三教同源』说。隋唐更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创立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的时期，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这些中国化的宗派甚至成为隋唐佛教的主流。明代净土宗大师株宏，由儒入佛，认为三教『本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云栖法汇·手著》）。佛教对其他文化的调和，是与中国古代社会思潮的变化相适应的，因此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不同的重点。但无论如何，其调和性则是其不变的一个文化特质。

中国佛教的特点也表现在它的融摄性方面。

这是就佛教内部的关系而言的一个鲜明特性。融摄性是指中国佛教传统摄佛教各类经典和佛教各派学说，从而具有统一佛教各地学风特性。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佛家虽然宗派林立，但基本没有如西方宗教那样出现冲突甚至血腥屠杀的现象。这在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台宗和华严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唐以后的著名佛教学者也都继续发挥融摄佛教各派信仰的特性，使各个宗派之间的互相融摄愈来愈显著，愈来愈紧密。先是禅宗与教宗的互相融摄，次是其它各宗分别与净土的合一，再是以禅净合一为中心的各派大融合。所以，在佛教发展史上，有不少高僧兼修各宗学说于一身，从而逐渐失去了不同宗派的特色。明代『四高僧』之一智旭甚至主张禅、教、律三学统一，会归净土：『禅者佛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法语三》，《灵峰宗论》卷二之三）所以，智旭主张把禅、教、律三学摄归于一念。

中国佛教的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简易性，即指教义和修行方法的简便易行。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由于其体系庞大，论证繁复，理论艰涩，因此往往影响其流传。也因此，中国佛教中真正延绵不绝的是在印度并没有成宗的禅宗和净土宗。尤其是禅宗，更是成为唐代以后佛教的主流。禅宗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具有简易鲜明的直觉体验的性质。譬如在禅宗看来，『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它强调『顿悟成佛』，否定旷世不息的累世修行，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佛教的简易性。如果说禅宗的简易性是建立在深刻的理性基础上，即抓住佛教的思想核心予以明快直截地阐述，并提出一套简易的修行方法，那么，净土宗的简易性则是建立在简单而浅显的信仰基础上。净土宗宣扬只要反复念诵佛的名号，念念不忘，就可凭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往生净土，犹如水路

乘船，非常快乐。净土宗将这一过程称为易行道。正是由此，这种净土法门以其简易方便而为缺乏文化但有信仰的平民教徒所普遍奉行。

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发展岁月。其间经过了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相排斥、互相比附、互相吸纳的过程后，最终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本土文化融汇为一，并形成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民族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佛教在完成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与本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交融，而且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于政治伦理以及哲学思想方面。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与政治关系也日益密切。在东晋南北朝时代，多数统治者都利用佛教教义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梁武帝热衷于奉佛，力图通过带头信佛来稳定政局。隋唐时代，各政治集团更是常常利用佛教来为其改朝换代提供辩护。除此之外，佛教宣扬一切都是『空』，引导人们超越现实来寻求自我解脱；其因果报应论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也在为世俗的社会秩序作论证；参禅和净土信仰更是给逃避严酷社会现实的人们提供了一处极好的心灵避难所。这一切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秩序的稳定。

佛教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释迦牟尼曾经用『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谓佛教『涵盖佛教的全部教义。据此中国古代的佛教高僧十分注意会通佛教与儒家向善的伦理观念。慧远大师就将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放在一起，加以互相印证。同时也不断有高僧会通佛教儒家的考论，宣扬『戒孝合一』论。此外，中国佛教坚决主张人人都能成佛，这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论无疑又是一致的。在伦理道德的修持方法和途径上，中国佛教强调灭除贪欲、无知和妄念，证得真谛，对宋明理学有重大的启发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家『主静』、『主敬』的道德修养理论，正是对佛教禅定说的改造。

事实上，就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而论，魏晋以来，佛教学者通过『格义』方法，从义理上就融合玄佛两种不同的思想。譬如般若学的本无派、心无派和即色派，就分别依傍于魏晋玄学的贵无论、崇有论和独化论。而僧肇的不真空论则不仅是佛教哲学理